



Zhongguo Shaoshu Minzu wenxueshi

中国少数民族 文学史

(修订本)

下册

马学良 梁庭望 张公瑾/主编



中国
少数
民族
文学
史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

(修订本)

(下册)

主编 马学良 梁庭望 张公瑾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学良

王妙文

刘保元

邢 莉

张公瑾

杨敏悦

耿金声

梁庭望

黄凤显

曾思奇

第五编

新民主主义和 社会主义时期民族文学

第一章 概况

第一节 社会概况

从“五四”运动到 20 世纪末,是中国社会由激烈动荡到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 80 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 80 年。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时期,一场最终埋葬剥削制度的生死搏斗从此揭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并进而进入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神州大地上掀起了热气腾腾的振兴中华的宏伟大业。80 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即从 1919 年“五四”运动到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新中国诞生至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尽管这两个阶段在革命的任务、目的和社会发展的状态上完全不同,但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前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两个阶段既有区别而又互相衔接。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①

这两个阶段是中国少数民族从觉醒到投身于革命和建设,最终获得民族平等和实行区域自治,民族地区发生巨大变化的历史性阶段。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封建制度,但却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先是军阀混战,继而蒋介石集团破坏了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用“四·一二”的屠刀残杀共产党人。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终成为英美等西方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代表,中国各族人民又一次陷入了三座大山重压的深渊。

面对屠刀,共产党人“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掀起了十年土地革命,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从20年代到30年代,中国少数民族从觉醒到奋起,投入了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先是水族邓恩铭参加了创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壮族农运领袖韦拔群在右江、红水河地区掀起了农民革命斗争;1929年的百色起义和1930年初的龙州起义,在壮族的腹心地带建立了包括20多个县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几百万壮族群众和东兰西山的瑶民参加了创建红色政权的斗争;1928年建立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1934年发展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苗、土家、侗等各族人民都积极地投入斗争。十年里,壮、瑶、苗等各族人民为土地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可歌可泣。

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各族人民都投入了抗日救亡斗争。在各大城市里上学、就业的各少数民族青年,踊跃投身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曲线救国、反对内战、反对投降卖国的各种抗日救亡活动。东北前线,满、朝鲜、蒙古等各族青年成为抗日联军的中坚,满族李兆麟是联军的创始人之一,白族周保中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兼政委。在河北,马本斋率领的回民支队使日军闻风丧胆。大批少数民族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又被派往各地抗日前线,浴血奋战。

如果说抗日战争把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动员起来投入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神圣事业,则解放战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全国所有少数民族都动员起来,与汉族人民一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结为一体,为彻底解放投入共同的斗争。各族人民参加解放战争的广泛性是前所未有的,由于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利益,铸成了空前的民族大团结。从解放大军到各地游击区、游击队,从城市到乡村的地下党和群众组织,都活跃着各少数民族的各级领导、革命青年和广大群众。各少数民族地区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而陆续获得解放。

新中国成立 50 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市场经济的大潮汹涌澎湃,古老的中华文明正焕发出时代的风采。尽管 50 年的道路也不平坦,但中华民族的振兴前景辉煌。50 年里,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变化翻天覆地。首先,历史上得不到历代中央政权承认的各少数民族,经过民族识别和确认,最终确定了一共 55 个少数民族,与汉族一起构成了 56 个民族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一件大事。

第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各族人民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政治愿望。根据中国国情,先后建立了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 5 个省级自治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理白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等 30 个自治州(盟);122 个自治县(旗),其中在 80 年代到 90 年代建立的自治县有北镇满族自治县等 19 个。按有关法规,自治地方的政府主席、州长、县长均由该自治区域主体民族担任,在各级政府、人大、政协中还有相应的少数民族干部和代表,总体比例通常高于民族人口比例。自治区域有相应的自治条例,以保护各族人民的各方面权益。

第三,实行多种形式的民主改革,废除奴隶制、封建农奴制、封

建地主制等剥削制度,各族人民得到真正的翻身解放。新中国成立前无论处于地主制、农奴制、奴隶制或原始社会末期的民族,经过民主改革,都越过一个或几个社会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种超越若干社会阶段的发展速度,在世界上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只有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才有可能发生。

第四,党和政府实行大力扶持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政策。毛泽东指出:“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① 周恩来也指出:“我们对各民族既要平等,又要使大家繁荣。各民族繁荣是我们社会主义在民族政策上的根本立场。”^② 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少数民族地区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经济文化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工业、农业、乡镇企业、教育、科学技术与新中国成立前相比,十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增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地处沿边的少数民族地区由边陲一下变为对外开放的前沿,边贸空前活跃。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边疆面貌急剧变化,焕然一新。人们的观念,精神风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科教兴邦,实现现代化,已成为各族人民的共识。

80年是短暂的一瞬,但少数民族都经历了饥饿、死亡、战争、解放、建设、初步繁荣的曲折历程,前后反差之大,变化之快,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特别是50年来,尽管有过这样那样的失误,少数民族地区进步和发展之神速,有目共睹。这一发展的趋势为未来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可逆转。从长白山到大兴安岭,从内蒙古草原到天山南北,从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到北部湾沿岸,民族地区正在涌动着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热潮,前景喜人。

①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② 转引自江平《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第26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

第二节 文学概况

文学是时代的镜子,前 30 年的激烈动荡和后 50 年的巨大变化,使少数民族文学在题材、主题、体裁、人物、手法、风格和功能等许多方面既与上一时期有相应的传承,同时又形成明显的时代特征。

第一,主题和题材的传承和扩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文学的主题回响着反帝反封建的主旋律。由于这一任务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才能完成,即使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我们仍在 30 年里处于帝国主义的军事包围之中,国家的统一尚未完成,因此,反帝反封建的主题和题材在少数民族文学中依然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其角度和思想高度已非上一阶段可比。主题的确定和题材的选择,纳入了无产阶级思想体系,总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完成的。反映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抗美援朝的作品,就是这一主题的延伸和发展。主题的扩展表现在反映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后者成为这一时期民族文学最重要也是最广泛的题材来源,用以歌颂共产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新人新事新生活,歌颂热火朝天的城乡建设,揭露社会遗存的一些阴暗面,批评不良行为和现象,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歌颂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赞颂民族的翻身解放和边疆建设的新貌,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从题材的广泛性上看,是过去任何一个文学阶段所不能比拟的。50 年来,我们从少数民族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电影、电视里,看到工业方面的钢铁工业、石油工业、有色冶金、电力工业、纺织工业、煤炭工业、机械工业等许多工业的题材;农业方面的科学种田、科学驯养、林海、林场、西双版纳热带森林保护和开发、北部湾渔业、水利建设、乡镇企业果林、蔗海、葡萄园、草原牧业、高原牧

业等等题材；社会变革方面如走出氏族社会、走出奴隶制、打碎农奴制的枷锁、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生产责任制等等题材；其他如民族团结互助、保卫边防、军民鱼水情、新思想、新人物、新风尚……，所有这些新事物，都成了文学取之不尽的“富矿”，而这些是过去所没有的。为了表现某一时代的主题，作家诗人可以选择任何方面的题材，而时代的发展恰恰为人们提供了这样的客观条件。我国在短短的半个世纪里，出现了如此众多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把民族文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正源于素材的丰富，题材的广泛，给作家们提供了灵感的源泉。

第二，体裁的伸缩和完备。体裁是作品的表现形式，是主题和题材的载体。当新的主题和题材出现而原有的体裁无法负载时，新的体裁就会产生。少数民族文学传统的体裁主要是民歌、叙事长诗、传说、故事、民间说唱文学、民间戏剧文学，作家文学中的小说、诗歌、散文总的来说远逊于民间文学，不少民族尚未产生。到了本时期的民族文学，传统体裁有的呈现萎缩之势。少数民族民歌在50、60年代仍有所发展，但到了80年代，随着文化教育的普及，已经有萎缩之势。民间长诗已不再大量产生，不少民族80年来已不再出现民间长诗。故事传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仍有产生，但已有合流之势，以传说为主，故事不多，新中国成立后亦然。民间说唱和民间戏剧有一定发展，但有与作家文学合流之势，即由作家或作家与民间艺人合作创作，用原来的戏曲形式表演。小说、新诗、散文大量产生，迅速发展，出现了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诗人、散文家。其中老舍、萧乾、李準玛拉沁夫、韦其麟等一批作家、诗人在中国文坛上享有盛誉，老舍尤其享有崇高的威望，为现当代文坛上领衔作家之一。少数民族中从未有过的现代话剧、歌剧、歌舞剧等戏剧文学、电影文学、电视剧文学，这时期得以产生，从而使民族文学的体裁趋于完备，空白得到填补。新诗是“五四”运动的产物，汉文新诗形式，有别于历史上的格律诗。它一产生，就对少数民族诗人产

生影响。壮族年青诗人韦杰三,20年代初期很快就掌握了这种新艺术形式,惜不幸于1926年在“三·一八”惨案中遇难,母校清华大学为他编印《韦杰三烈士集》,其中收入新诗57首,译诗34首。自此以后,少数民族中不断出现以汉文新诗形式创作的诗人。

在民族文学历史上,仅藏族、蒙古族、满族、维吾尔族、朝鲜族等少数几个民族有过小说这种体裁的作品,且数量很少。据统计,一千多年里仅有长篇小说10多部,大多数少数民族阙如。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小说出现了第一次创作高潮,大革命时代的作家群、东北沦陷区的作家群、国统区作家群、延安作家群相继创作了一大批短篇、中篇和长篇小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小说才得以普遍的孕育和产生,原来尚未有小说的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绝大部分都填补了自己的空白,有长篇小说的也不在少数。

自国外引进的新戏剧文学形式,80年来也有一定的发展。早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这种文学形式就开始在广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出现。30年代到40年代,新疆地区的话剧就有一定的发展,哈萨克作家尼哈迈德·蒙加尼的四幕话剧《战斗的家庭》、锡伯族作家郭基南小话剧《满天星》和《太行山下》、维吾尔族作家祖农·哈迪尔的时事活报剧《游击队员》和《相逢》都产生过较大的反响。新中国成立后,新戏剧文学有一定的普及,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代表作家为老舍,他先后创作了话剧《方珍珠》、《龙须沟》、《女店员》、《全家福》、《西望长安》、《茶馆》等众多作品,产生很大的反响,《茶馆》被认为是“东方舞台上的奇迹”,是当代中国话剧舞台上最优秀的剧目之一。他还创作了儿童剧、童话剧、歌剧和话剧歌剧混合剧。但由于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和创作力量的双重制约,新戏剧文学在少数民族中仍不普遍。多数用汉文创作,在懂得汉语的观众中流传,用民族文字创作的比较少。

我国电影事业初兴于20世纪初年,80年代末少数民族中开始出现从影艺术家。但真正得到一定发展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到

了80年代,少数民族的影视事业开始发展起来。几十年来,出现了一批有一定艺术水准的影视文学作品。《刘三姐》、《阿诗玛》、《冰山上的来客》、《李双双》、《老兵新传》、《甜蜜的事业》、《傲雷一兰》、《努尔哈赤》、《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等都曾产生过很大影响。这些作品有的是少数民族作家和汉族作家联袂完成的。蒙古族作家李準先后创作或改编了20多部电影,取得很大的成功。

总的来说,少数民族文学中新体裁、新作品,正日益成为主流,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正赶上乃至超过民间文学。

第三,手法的创新和风格的嬗变。这一时期出现在民族文学视野的是新形象,需要有新手法、新语言、新色调来描绘、刻画,这必然导致手法的创新和风格的嬗变。手法的创新并非丢开传统,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外来的手法,予以消化。“五四”以后,西方的文学作品被大量介绍到中国来,带来了国外多种风格多种流派的艺术手法。有的是传入汉族地区,影响汉族文学的手法和风格通过汉文学又影响到民族作家;有的则是少数民族作家直接借鉴自国外。老舍具有代表性,“五四”带来的文学革命冲击着他的心灵,1924年他赴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讲师,读了大量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名作,对他后来的创作产生很大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狄更斯和康拉德等。特别是狄更斯那讽刺、幽默、夸张的手法,轻松自然的风格,个性突出、形象鲜明的人物塑造,精练通俗的大众化语言,对老舍有很大的启示。他一度被称为“笑匠”,后来转入现实主义的严肃基调,作品仍经常出现机智俏皮的语言,嬉笑怒骂融为一体,用以描绘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搏击中市民阶层的惶惑、犹豫、寂寞的心理和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径,取得很大成功。其小说和古代的章回体完全不同。

时代的改变也带来风格的嬗变,传统的民族文学作品,总体上偏于沉郁和悲怆,而到了这一时期,色调为之一变,由高昂而趋于明快,催人奋进。这种高昂是与现实主义手法占主导地位相辅相成

的。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一方针的导引下,作品发出了争取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呐喊,有一种催人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艺术力量。在左右江革命时期产生的众多民歌里,人们听到的是“穿鞋不怕鞋子烂,跌山不怕拉耳环;壮民革命不怕死,死为革命也心甘”这样昂扬的作品。即使沦陷区、国统区限于环境而采取曲折隐晦手法的作品,字里行间也隐伏着地下的烈火。社会主义时期,这种高昂的风格变得明朗而强劲,欢呼解放,赞颂成就,批评缺点,展望未来。当然,生活中也有失误,有悲伤,有阴暗面,并反映到作品之中,但这与封建时代悲怆无奈是不同的。

第四,手段的更新和功能的扩展。手段指传播手段,在漫长历史时期中,民族文学的传播方式主要是口头传承,而本阶段文学逐步与新闻媒体结合,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区域性被打破。左右江革命时期,韦拔群把歌圩改进为歌会,组织民间歌手通过歌会以壮歌形式和扳报方式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收到很好的效果。湘鄂川黔、湘鄂等民族地区革命根据地也通过多种形式充分发挥民族民歌的功能。50年代,各少数民族地区黑板报、墙报、油印小报、广播站、广播电台和报刊上频频出现民歌、民间故事传说、小小说、散文、小戏等作品,一下子扩大了文学的阵地,充分发挥了它的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进入80年代到90年代,影视艺术蓬勃发展,报刊如雨后春笋,电视系统及卫星电视的覆盖面空前扩大,几无死角,文学艺术以空前的速度向四方传播,范围不仅扩大到全国各个角落,而且扩大到世界范围,少数民族文学也不例外,文学不仅保持原来的教育功能、认识功能、娱乐功能、社会组织功能、社会调节功能、鼓动功能,而且得到强化,充分发挥其审美的作用,同时加强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增进理解和民族团结。对外还可以展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风采和民族文化的神韵,使各国人民领略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五彩缤纷和灿烂辉煌。以电影《刘三姐》为例,该片自60年代初上映即受到国内外的广泛欢迎,一直到80年

代,在欧美和东南亚依然受到青睐,长盛不衰。许多外国朋友通过它那令人叫绝的对歌了解壮民族的心理和文化特点。民族文学的这种传播势态,适应了各族人民愈来愈新的审美要求,又反过来提高了人们的审美眼光,满足不同阶层的审美理想。

第五,作家文学的崛起和作家队伍的形成。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少数民族一直是民间口头文学领衔,民间神话、民歌、长诗、故事、传说从数量到艺术水平都占有绝对优势。作家文学只在很少的几个有民族文字的民族中产生,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直到1949年都还没有书面文学而只有民间口头文学。有一部分掌握汉文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用汉族古典诗词格式创作诗歌,但从总体上看艺术水平难以与汉族诗人相比,在少数民族中的影响也比较小,不足以和民间文学相匹敌。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由于教育的发展,少数民族出现了大批人才,为民族文学的发展繁荣创造了条件,于是出现了一批又一批少数民族出身的作家、诗人、散文家、戏剧家、文艺工作者和业余作者,作家队伍形成。1996年,中国作家协会和国家民委联合举办了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63位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获奖,其中珞巴族、塔塔尔族、基诺族第一次有自己获奖的作家。至此中国55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获全国性文学奖的作家。据统计,至1998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已有会员600多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少数民族会员600多人,省区级作协会员中少数民族会员5000多人。这是一支庞大的作家队伍,它由三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民主革命时期就活跃在文学战线上的老作家,一部分是50、60年代成长起来的中年作家,再一部分是80、90年代崛起的中年青年作家,人才济济,老少咸集。这个民族作家队伍不仅庞大,而且在中国作家协会、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等文学团体的组织下,互相交流,交叉采访,组织评奖,有共同的阵地,形成了一支统一的文学大军,这是史无前例的。

第六,采风的硕果和研究的深入。中国素有采风的传统,古时

“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①这样，“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②因利于统治，历代因之。但也有不少有识之士是深谙民间文学的价值而采风的。采风的区域主要为汉族地区，历史上对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搜集很少，大体让其处于自生自灭或口头传承状态。最有名的《粤风》也仅收入壮族民歌 37 首、瑶歌 21 首。“五四”运动以后，胡适、顾颉刚、钟敬文等开始重视民间文学，胡适将搜集到的民间文学材料编著成《白话文学史》，顾颉刚早在 1917 年便着手搜集苏州民歌，1920 年加入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钟敬文 20 年代前即搜集故乡歌谣，20 年代在岭南大学任职时编辑了《民间文艺》，并在对《粤风》的标点、注释、译为无韵新诗刊行的活动中对少数民族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三四十年代，闻一多、贾芝、马学良等已着手对少数民族文学作深入的研究。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这些搜集和研究是很零散的，而且只有很少的有识之士进行。大规模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得以开展。

50 年来的民族文学搜集、整理和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50—60 年代的全面搜集、重点整理阶段。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百废待举，1950 年 3 月即成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理事长为郭沫若，副理事长为老舍和钟敬文。各省区随即成立了分会，有关民族省区的分会立即组织力量，深入民族地区搜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1956 年，国家民委、中国科学院和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前身）协同，组织了 7 个少数民族语言调查队 700 多人分赴 15 个省区对 42 个少数民族进行大规模的语言调查，搜集到了大批民间文学资料，为后来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当然，这项

① 《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传》何休注。

② 《汉书·食货志上》。

工作当时远未完成,80年代初期,国务院批转了国家民委关于搜集整理出版少数民族古籍规划报告,文学作品占了古籍的相当比重。在全面搜集的基础上,重点整理硕果累累,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的长诗《阿诗玛》(彝族)、《创世纪》(纳西族)、托忒文《江格尔》(蒙古族)、《召树屯》(傣族)、《娥并与桑洛》(傣族)、歌剧《刘三姐》(壮族)、《玛纳斯》(柯尔克孜族,出版部分章节)“格萨尔”(藏)等大批作品就是这期间完成的。目前,各有关省区正在加紧完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使历年搜集到的大批宝贵材料得出面世。

第二阶段始于50年代末,80年代继之,是为编写单一民族文学史、文学概论的时期。民族文学史规划的提出始于1958年7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编写座谈会上,确定了首批书目和分工,开始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文学工程。此后先后于1960年8月和1961年3月由社科院文学所召开两次座谈会。80年代初交70年代末成立的少数民族文学所主持,确定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丛书》。这套丛书的特点是克服50年代偏于民间文学的研究,将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一起融为一书,编撰单一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至今已出版了《壮族文学史》、《藏族文学史》、《蒙古族文学史》、《毛南族文学史》等20多种。

第三阶段始于80年代中期,其特点首先是克服单一民族文学研究的局限,把55个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探讨。再一点是从以史料归纳为主进入到民族文学的理论探讨阶段,深入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范围、特征、研究方法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华文学中的地位。90年代开始取得成果,1992年1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出版了,填补了空白;同年出版了按文体分类的《中国现代少数民族文学概论》。1984年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史》。1986年出版了《中国当代民族文学概观》和《少数民族文学》。1997年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和1998年

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论》，是民族文学中首次出版的两部理论专著。1998年出版的《中华文学通史》，第一次把汉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融于一书，向真正的《中国文学史》迈进了一步，有开创性的意义。

通观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文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民族文学作为中华文学不可分割的部分，其重要地位得到了确认。在中国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背景激发下，少数民族文学体裁趋于完备，手法得到创新，并有较强的思想性和时代感，发挥了重要的功能，为民族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初步的基础。